

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与和谐社会

——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

岳经纶*

【摘要】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的过渡期,也是一个挑战与机会并存的变革时代。面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社会不和谐,进步主义者把注意力放在改造政府的角色上,认为通过运用社会科学知识,改善政府效率,重构公私界线,可以化解阶级对抗,实现社会和谐。在进步主义者的推动下,美国在20世纪初进行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成功地化解了社会矛盾,避免了社会革命,进而确立了美国在20世纪的强国地位。本文旨在分析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者如何利用社会科学知识,通过个人倡导和公民参与等方式,推动社会变革和达致社会和谐。

【关键词】进步时代 阶级冲突 社会科学 个人倡导 和谐社会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的过渡期。在工业化、技术进步、移民潮和城市化的冲击下,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经济转型。传统的社会阶级结构和权力形态开始瓦解,新的社会经济问题开始出现,如经济垄断、政治腐败、城市贫困、童工、血汗工厂、劳资冲突等。可以说,19世纪最后10年见证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和危机(Glad, 1975)。当然,工业主义带来的不只是危机和冲突,也带来了希望和想象。可以说,世纪之交的美国处在一个挑战与机会并存的变革时代。乐观主义者认为,美国工业主义带来的社会矛盾终将得到解决,美国可以进入没有

* 岳经纶,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文受中山大学“985二期”国际交流项目“美国进步时代研究”资助。同时感谢《公共行政评论》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阶级对抗的和谐社会。悲观主义者认为,美国的阶级对立将进一步恶化,甚至出现社会革命。更多的美国人在思考:美国社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原因何在,有没有解决的办法(Gilmore, 2002:3)。于是,各种社会改革的方案被提了出来。要求推翻现有工业资本主义制度者有之,要求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造者有之。在回应工业主义带来的种种弊端的社会改革中,最基本的社会改造方案有两种:一是劳工运动的方案:替代资本主义;一是进步主义者的方案:承认工业社会不和谐的存在,但是接受工业社会的到来,并致力于通过社会改革来改善工业社会的秩序,减少社会问题(Hofstadter, 1955)。面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社会不和谐,进步主义者认为,他们时代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激进主义。他们反对平民党(Populist Party)的无政府主义和激进劳工运动的社会主义主张,把注意力放在改造政府的角色上,认为通过运用社会科学知识,改善政府效率,重构公私界线,可以化解阶级对抗,实现社会和谐。在进步主义者的推动下,美国在20世纪初进行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成功地化解了社会矛盾,避免了社会革命,进而确立了美国在20世纪的强国地位。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同样也处在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当然,还有市场化和全球化)所驱动的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之中,同样也面对着工业主义带来的社会经济矛盾,如贫富分化、官商勾结、血汗工厂、劳资矛盾等。研究美国上一个世纪之交的社会问题及其化解之道,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的宗旨是分析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者是如何利用社会科学知识,通过个人倡导和公民参与等方式,推动社会变革和达致社会和谐的。简言之,就是分析社会科学及其运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作用。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概述进步时代美国的社会不和谐状况;第二部分分析掌握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主义者如何看待美国的社会问题;第三部分讨论进步主义者如何看待社会科学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第四部分以3个实例来说明进步主义者如何利用社会科学推动社会和谐;第五部分是文章的结语。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研究方法,资料来源于有关进步

时代的英文文献。

一、世纪之交的美国：工业主义下的不和谐社会

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正在经历着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转型。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潮是这一大规模社会经济转型的推动力。自内战(1861-1865)结束后,美国工业进入急速发展阶段。机器的广泛使用、各种新发明的出现、铁路网的形成,以及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工业的迅速发展。而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从欧洲大陆及美国乡村涌入的廉价移民劳工则为美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基本条件。

快速的工业化对置身于工厂中的工人们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工业化的发展造成了大量的工业伤亡,也带来了童工、血汗工厂、劳资冲突等劳工问题;另一方面,工业化也推动了劳工团结,带来了蓬勃发展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快速的工业化也带来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许多城市因为工业规模的扩展而迅速膨胀,把大量原来居住在乡村的农民卷入城市,变为雇佣劳动者。原来的手工业者则在大机器生产的挤压下,迅速破产,被迫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国内的人口流动还伴随着来自欧洲的移民潮,因为美国的经济繁荣吸引了欧洲大陆移民纷纷进入美国。城市化和移民大量涌入,恶化了城市环境,带来了贫穷、疾病、犯罪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恶劣的居住条件、不卫生的食物、童工等则恶化了美国的家庭环境。

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潮急剧改变着美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进入到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严重的危机笼罩着美国社会(Glad,1975:34)。经过多年的经济扩展,美国社会产生了新的权力结构。市场竞争的发展,不仅摧毁了传统的手工业,而且使得工业发展日趋集中,出现了“大工业”、“大资本”和“大政治”(Hofstadter,1955:131-148)。以大财团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控制了政治权力,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威胁着美国的民主。随着大企业和公司资本主义

(corporate capitalism)的发展,新的专业管理阶层崛起,颠覆了传统的社会精英结构。而进入美国的移民则聚集在城市的贫民窟,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不安全的工作环境,长时间的工作,对童工和移民工人的剥削,导致工人组织起来,不断进行抗争。以 1893 年纽约股市的暴跌为标志,美国开始进入严重的经济萧条期。大萧条(1893 - 1897)带来了失业和劳工动荡,破坏了很多人的“美国梦”,他们感到平等机会不可能实现。可以说,无休止的劳资冲突,不断流动的人口,不断涌入的移民,不断加剧的城市社会问题,不断扩大的移民工人阶级队伍,以及政治的腐败,为 19 世纪最后十年的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不安(Stromquist, 2006:15)。

而在 19 世纪晚期美国社会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则是阶级冲突(Stromquist, 2006:16)。迅速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美国社会阶级结构日益分裂为劳工与资本两大对抗的社会阶级。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和利益对抗成为美国工业社会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雇佣劳动制度(wage labour system)和劳资关系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对刚刚进入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工人来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结果。为了对抗雇佣劳动制度和工业主义带来的社会弊端,美国工人的选择是团结起来,寻求雇佣劳动制度之外的选择。早在 1866 年,美国工人们就进行了成立全国性组织的第一次尝试,建立了“全国劳工联盟”(National Labour Union)。在其主席 William H. Sylvis 的领导下,劳工联盟开展的主要活动试图通过组织合作企业(cooperative enterprises)来取代雇佣劳动制度。工人们把资源集合起来,自己劳动并管理工厂。虽然工人们情绪高涨,充满热情,但是,由于缺乏资本,没有管理经验,再加上工厂的生产能力有限,合作企业没有取得成功。三年后,美国工人们又成立了“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试图在更大规模上团结美国工人以对抗资本。劳工骑士团是服装工人、铁路工人、船坞工人、农场工人、雪茄制造者、钢铁工人等工会组织的联盟。劳工骑士团成立后,

成员数量直线上升,在高峰期的 1886 年,劳工骑士团的成员估计在 70 万到 100 万之间。而其他分散的工会组织则大约有 10 万到 20 万会员,两者相加,相当于 20% 的美国非农业劳动力参加了工会组织 (Stromquist, 2006:22)。

随着组织壮大,劳工骑士团的行动也变得大胆起来。在 1880 年代,劳工骑士团发动了若干次流血罢工,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其中,以 1886 年 5 月在芝加哥的“干草市场事件”(Haymarket Riot, 又译“秣市骚乱”)最为著名。这次罢工遭到了政府镇压,使劳工骑士团元气大伤。到了 1888 年,劳工骑士团成员锐减为 222,000 人;到了 1895 年只剩下 20,000 人(Fink, 1983)。

一些不满劳工骑士团策略的工会领袖在 1888 年分离出来,成立了温和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此后,劳工联合会成为美国的主导性劳工组织。劳工联合会的主体是白人熟练工人。其会员人数从 1891 年的 238,000 人,发展到 1910 年的 1,562,000 人,到 1920 年更达到 4,078,000 人(Gilmore, 2002: 9)。与劳动骑士团不同,劳工联合会接受雇佣劳动制度,其目的不是要推翻雇佣劳动制度,而是要改善它。劳工联合会的领导追求的目标比较温和、具体,主要是更高的工资,八小时工作日,更好的工作条件,废除童工。劳工联合会的主张得到了非工会成员的进步主义者的支持。

进入 19 世纪最后十年,由于严重的经济衰退,劳资对立更加明显,出现了严重的劳资对抗。1894 年春夏之间爆发的“普尔曼罢工”(Pullman Strike)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大罢工,涉及 15 万工人,27 个州,瘫痪了全国铁路系统。它是 1890 年代美国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时期一次最重要的和影响深远的劳资冲突。这次大罢工肇始于 1894 年 5 月芝加哥市工业区普尔曼的火车车厢制造工人的工资谈判。受 1893 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影响,普尔曼车厢制造厂不仅裁减工人,而且大幅削减在职员工的工资,同时却不减少员工的住房租金,因为普尔曼的工人都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中。工人就工资问题

与雇主谈判,但毫无结果。于是,工人们在5月11日开始罢工。由于普尔曼的工人隶属于“美国铁路工会”的下属工会,因此,工人们请求美国铁路工会的支持。美国铁路工会试图进行仲裁,但遭到资方拒绝。6月20日,美国铁路工会发出通知,宣布从6月26日其会员不再装卸列车,包括普尔曼生产的客车车厢。虽然美国铁路工会的行动集中在芝加哥,但使全国的铁路交通瘫痪了。在资方的影响下,联邦政府决定对罢工进行干预。7月2日,联邦法院应司法部长的要求,发出禁止令,宣布所有罢工活动非法。7月3日,总统克利夫兰调动联邦正规军进入芝加哥和邻近地区。由于军队的介入,原本和平的罢工演变成暴动。工人捣毁铁路和列车,军队向工人开枪,杀死12名工人。美国铁路工会主席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被捕。8月2日,普尔曼工厂复工,罢工失败。美国铁路工会被解散,工人被迫保证不再组织工会。

普尔曼大罢工在美国劳工运动和政治发展中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跨行业的全国性罢工,显露了19世纪末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阶级对抗;第二、联邦政府第一次运用禁止令来宣布罢工非法,是对劳工运动的重大打击;第三、美国总统第一次动用正规军队介入罢工,是美国政府首次使用联邦军队枪杀违背国家意志的美国公民。普尔曼罢工失败后,美国劳工运动步入低潮。

二、进步主义者:在社会冲突中寻求和谐

作为对19世纪后半叶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的一种回应,进步主义运动在19世纪最后十年开始形成,并且在重建美国和谐社会的计划中取得了领导地位(Stromquist, 2006:16)。尽管历史学家对进步主义者的构成存有不同看法,可以肯定的是,进步主义者是由在美国内战之后出身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所组成。他们深受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危机这一共同经验的影响。而这种社会危机的突出表现就是劳资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阶级问题是进步主义改革者的关

注重点之一。

进步主义者中有知识分子、社会福音改革者、知识女性、劳工运动活动家、反叛的政治家。他们从老一代改革传统、从废奴主义运动、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获得灵感。他们对社会进步有着强烈的信念,相信受过教育的人有能力解决问题。通过组织志愿性机构,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在进步主义者的队伍中,还包括“耙粪”新闻记者(**Muckrakers**),他们以道德义愤抨击腐败和政治丑闻,如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ans**) 在《城市之耻》(**Shame of the Cities**)(**Steffans**, 1904)中揭露城市当权派;爱达·塔贝尔(**Ida Tarbell**)揭露标准石油托拉斯(**Standard Oil Trust**)的滥权(**Tarbell**, 1904);厄普顿·辛柯莱(**Upton Sinclair**) 在《丛林》(**The Jungle**)中攻击猪肉加工业(**Sinclair**, 1906)。

对于工会力量的崛起和劳工运动的激进主张,进步主义者一方面认为,劳工组织的发展是对城市劳工大众真正需要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他们也感到劳工组织的兴起对他们是一种威胁(**Hofstadter**, 1955)。进步主义者虽然看到了工业社会的弊端,承认美国社会的不和谐,而且也表达了不满,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接受工业社会的到来,很少想到要瓦解和取代资本主义(**Lasch**, 1991)。他们认识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瓦解了前工业社会存在的社会同质性和社会共识,非常担心美国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和对立。因此,他们致力于创造可以调和对抗阶级利益和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机制,他们摒弃了劳工运动的激进目标和极端手段,同时致力于通过改革满足劳工大众的基本需要。

进步主义有三个本质特点:对工业主义的一种态度,乐观主义和干预主义(**McCormick**, 1986: 269 - 270)。虽然对进步主义及进步主义者的内涵存有分歧,进步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对工业主义的某种与众不同的态度(**McCormick**, 1986: 269)。到 20 世纪初,大多数美国人看起来已经接受了大企业的存在,尽管不太情愿。进步主义者也抱同样的态度。他们进行改革不是为了瓦解现代工商业,

而是要改善和提升工业生活的条件。然而,进步主义是与那种对工业主义后果的挥之不去的愤怒纠缠在一起的。对工业主义既接受又表示愤怒是进步主义的内在特点之一。同时,这些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具有一种明显的乐观主义:那就是通过持续不断的人类行动,人类可以改善自己的环境。受到工业化伤害的人可以得到保护,他们的环境可以变得更人道。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和作家们撰写了大量文献来谴责自由放任主义,同时坚信人类改善自己条件的能力。甚至是对哲学问题不感兴趣的改革者也吸收了那个时代的乐观主义和环境决定主义。他们的改革反应了这种思想习惯(Mowry, 1958: 16-37)。

干预主义构成进步运动的第三个特征。进步主义者相信通过干预人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可以带来秩序。而这种干预既可以由国家来进行,也可以通过志愿性组织来进行。他们尤其主张通过干预环境,特别是企业的活动来改善工业生活条件。

进步主义从两种信仰和知识体系中找到了灵感,以至实质和方法,这就是新教社会福音主义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们赋予了进步主义时代改革与众不同的特质(McCormick, 1986: 270)。社会福音主义是为了回应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理论而在美国新教徒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思潮。社会福音主义的要义是清洗罪恶的世界,如奴隶制度、纵欲等。社会福音主义信徒强调集体的责任,认为对工业社会的乱局进行合理化的最好办法是合作和关怀,就像耶稣所倡导的那样。进步主义带有明显的社会福音主义的精神气质。社会福音主义帮助进步主义者填平了个人权利与集体责任之间的鸿沟。在社会福音主义影响下,19世纪的改革者投身社会改革运动,全心全意致力于减少社会痛处,争取社会公正。当然,并非所有的进步主义者都信奉社会福音主义,但是,当时很少有改革不带有新教信仰复兴主义的精神和方法(Crunden, 1982)。

科学对进步主义的内容和方法都有重大影响。许多著名改革者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科学家,也就是说,是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和心

理学这些在 1880 年代至 1910 年代出现的新兴学科的追随者。受当时的环境决定论和国家干预理论的影响,他们相信能够设计出理性的措施,并用它来改善人类生存的条件。他们的方法包括这样的要素:调查事实,应用社会科学知识,委托受过训练的专家去决定应该如何做,最后是授权政府官员去采取科学所建议的措施(Lubove, 1965; Haskell, 1977; McCormick, 1986: 271)。

进步主义者追求社会和谐的主张与 1894 年的普尔曼大罢工有相当关系。许多进步主义者,特别是在芝加哥的知识分子都卷入了普尔曼罢工活动。1893 年,芝加哥的进步主义者成立了“芝加哥公民联合会”(Chicago Civic Federation),著名社会改革家如简·亚当斯(Jane Adams),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贝密斯(Edward Bemis)等都是其中的成员。普尔曼罢工开始后,亚当斯、贝密斯及公民联合会中的一些成员积极介入,试图通过仲裁解决劳资冲突。公民联合会的主席莱曼·盖奇(Lyman Gage)对仲裁情有独钟,在他的努力下,成立了一个由各方代表参加的和解委员会,试图充当中立的第三方,把对抗的劳资双方拉到谈判桌前。和解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联邦工业委员会成员和公民联合会的成员,其中有亚当斯。在五、六月间,和解委员会进行了多次努力,游说罢工工人和普尔曼管理层进行自愿仲裁,但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资方普尔曼公司拒绝仲裁。亚当斯对普尔曼资方拒绝仲裁非常失望。普尔曼罢工的流血结局令亚当斯等进步主义者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劳动与资本应该建立怎样的道德关系?阶级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吗?对抗有用吗?如何防范或解决未来的罢工?(Knight, 2005)

普尔曼罢工及其带来的流血冲突令进步主义者对工业社会的不和谐问题形成了新的看法,那就是:为了实现社会进步,阶级必须和解,阶级冲突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普尔曼大罢工的经验强化了他们的信念:他们必须成为新秩序的代表(agents of a new order)。他们自认为是林肯式共和党传统的民主理想的继承者,要献身于这一传统,要致力于缓和阶级差别。他们寻求建立一个更和谐的社会。

他们反对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激进主张,坚信阶级冲突是可以超越的,阶级之间的社会和谐是可以协调的,不分阶级身份的公民,即人民可以成为美国社会民主重建的原动力 (Stromquist, 2006)。

三、进步主义者:社会科学能够促进社会和谐

进步主义者主要是年轻的专业人士,他们致力于把专业知识和精神(医学、法律、工商管理、教育)用于解决社会问题。进步主义者独特之处是他们坚信:人类,男人和女人都是社会造物 (social creatures)。人类生活在既有社会契约、也有社会冲突的大城市中,必须承认他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并且要通过寻求共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认为,通过改造政府和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可以有效应对一个异质性的工业社会中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冲突。

现代美国社会科学肇始于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它的兴起直接回应了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引起的社会转型。当时,在纽约、芝加哥、剑桥和其他地方开办了首批研究院,招收社会科学研究研究生。在学院内,政治和社会观点相左的学者们常常对他们有份建构的社会问题进行争论。在学院外,他们有时与政客们、资本家、劳工领袖和私人基金会的负责人争吵。但是,当体制内机构不愿意插手有争议性的政治或社会问题时,他们就自己成立协会、组织、社区中心,或者支持改组或成立其他的组织,如大学和现代慈善基金会。在整整一代人中,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上进步的社会科学成为了城市和国家政策制定、文化形成中的不断壮大的力量。社会科学家,就如同过去的僧侣、牧师一样,利用他们的信仰作为工具,争取学术和行动,为自己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充权 (Recchiuti, 2006)。

进步改革者们相信,社会科学的运用可以促进社会和谐。19 世纪晚期的社会危机使进步主义者深刻认识到,美国社会中的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常常会带来相互伤害。虽然进步主义改革者知道,社会和谐不能从利益对

立的社会群体中自发产生,但是他们相信基于人类相互依存的理念,通过对社会科学知识的使用和管理,可以自上而下创造社会和谐(Glad, 1975:107)。因为社会科学提供了通过设计改革来管束和协调相互对抗的社会团体的可能性。如果可以收集到足够的事实资料,并加以正确理解,就可以找到对每个人都有利的解决办法。虽然个别的改革可能对某个群体有利,而对另一个群体不利,但是一项以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而精心设计的改革方案可以建立起利益之间的更加完美的和谐,甚至还甚于自然的和谐。

进步主义者相信,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可以提升公民个人的效率;个人越有效率则越可以增加他们实现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机会(Glad, 1975:107)。社会科学知识的运用可以改善政府的效率。如果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能够在税收、土地使用、城市规划、自然资源、劳动就业、交通运输等各种专业领域得到社会科学专家的指导,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知识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就可以设计出优良的改革方案,从而改善政策效率。不过,进步主义者也担心,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专家被特殊利益团体控制,成为他们谋求特殊利益的工具。为此,他们也设计出了防范方案,那就是:努力争取政治改革,使人民在选择和控制官员方面有更大的权力。他们争取的政治改革具体包括:通过直接初选提名公职候选人、实施参议院直接选举、法案提出权、公民投票、召回代表,以及妇女选举权,目的是给予公众对政府的更直接的控制。他们相信,让人民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声音,可以确保那些尚未组织起来或者还没有加入某一特殊利益团体的公众的政治影响力。进步主义者相信,在一个直接民主改革打破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的社会中,各阶级成员之间的合作可以在掌握社会科学知识的专家意见的协助下实现有效的管制(Glad, 1975:108)。

进步主义者认为社会和谐可以自上而下创造的观点与他们的政府观密切相关。进步主义者对自美国独立以来即被广泛接受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提出了挑战。传统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认为,民主有赖于个人选择的最大化,而这里所谓的个人只是男性白人。为了

推广这个个人权利哲学,美国人弘扬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即所有(男)人都享有任何政府都不可以褫夺的自然权利,一个不干预的政府就是对个人权利最好的保护。简言之,这套信念意味着最好的政府就是对日常生活干预最少的政府,是让个人自由去作出适合自己各种选择的政府。通俗地说,在进步时代之前,很多美国人都相信,一个人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孩子是上学还是上班。立法者不应该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因为这类法律会限制个人选择工作时间的权利。

进步主义者认同政府应对个人和社会团体承担责任。他们坚信,一个无私、中立的政府可以在维持社会团结和社会和谐方面承担更积极的角色。他们甚至把政治比作“扩大了的家务管理”(politics as enlarged housekeeping)。进步主义者期望中的积极的、中立的国家是可带来正义的(Glad, 1975:110)。事实上,进步主义概念本身即暗含这样的意思:政治权力的公正行使可以防止因为竞争的利益集团而带来的社会瓦解(social disruption)。进步主义也致力于发展社会基本福利,即使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Glad, 1975:110)。

进步主义者吸收了平民党的许多改革主张,开始用新的角度来看待个人自由与政府干预。平民党在1890年代提出的改革主张,如重组货币、管制铁路、反垄断立法、8小时工作日等,都出现在进步主义者的议程中。平民党人对进步主义者的最重要的贡献大概要数承认人民利益的整体性。平民党人认识到,农民和工人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合作,共同对抗资本家对他们行使的集中权力。他们并且认识到,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有时会伤害人民的整体(Gilmore, 2002:12)。受平民党思想的影响,进步主义者认识到,个人权利的最大化常常是以团体利益为代价的。没有8小时工作日立法,雇主会把10小时、12小时工作当作工日标准。因此,进步主义者试图在坚持个人权利的同时,寻求表达公共利益的方式。进步主义者认为,对个人好的东西可能对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有害。他们认为,政府的存在就是要平衡个人权利与集体福祉。例如,政府应该有权管制童工,因为所有人都可以从受过良好教育的选民和有生产力的劳动者中受益。

在进步主义者看来,你的孩子不只是你自己的孩子,他们代表未来文明的种子。

进步主义者是改良主义者,不是激进主义者。他们真诚地认为科学(science)和行政(administration)法力无边,可以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他们致力于把科学和行政应用于更高的道德目的。基于这样的假设,进步主义者相信政府是可以实施广泛的社会改革的,而掌握社会科学知识的专家则可以为政府的社会改革方案提供科学的方法(scientific solutions)。虽然进步主义者认同政府要对个人承担责任,不过,他们从未想过联邦政府要变成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最初,他们并没有打算扩大有限的政府的范围。他们最初把希望放在志愿组织上,认为志愿组织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改善社会。通过志愿组织,男人和女人们可以在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团体中携手合作,共同解决他们社区面临的挑战。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者越来越多地依赖公共机构来实施他们的改革项目(Chamber II, 1980)。事实上,进步时代的许多重大改革是因为西奥多·罗斯福这位著名的进步主义政治家当选为总统而得以推动。

基于社会科学知识的运用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进步主义改革者对社会问题都采取了大致一样的解决办法。在一个社会改革模式开始广为人知的时代,社会改革的不同方法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进步主义者的使用。进步主义者解决社会问题的典型做法如下:第一步,组织一个自愿性组织(voluntary association);第二步,对问题展开调查(investigating);第三步,收集相关社会资料(gathering);第四步,按照某一新的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分析这些资料(analyzing);第五步,通过这种分析,得出初步的解决办法(proposing);第六步,通过教育运动和道德劝说来推广这些办法。这些办法最后有可能被某一级政府接受,成为一个常设的公共职能(McCormick, 1986: 283)。

四、行动中的社会科学：个人倡导与公民参与

进步时代的美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科学实验室。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不仅是社会科学思想和组织的中心，也是社会科学和进步改革的孵化器。由社会科学学者变身而来的活动家们结成了一个网络，他们领导着各种改革协会、社团、委员会和联合会；创建社区服务中心（settlement house，也译为“睦邻之家”、“贫民睦邻安置所”）；进行城市和工业调查；为童工权益进行呼吁；推动市政改革；争取地方、州和联邦的立法改革；协助创建政党——进步党来推动他们的改革理念。

纽约作为美国第一大城市是进步时代大多数主要改革组织的总部所在地，如帮助贫困失业者的“慈善组织协会”（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美国第一个睦邻之家“大学安置和学院安置”（University Settlement and College Settlement）；3个主要的工人权利和社会保险组织：“全国消费者联盟”（the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全国童工委员会”（the National Child Labor Committee）和“美国劳动立法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abor Legislation）；调查政府腐败行为的最积极的团体“市政研究局”（the Bureau of Municipal Research）；争取美国黑人民权的、新的全国性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和“全国城市联盟”（the National Urban League）。社会科学家兼活动家是创建和领导这些组织的中坚力量。在“全国消费者联盟”、“美国劳动立法协会”和“市政研究局”中，他们扮演了主导角色（Recchiuti, 2006）。

这些组织的成员虽然并非全部都受过社会科学的高等教育，都拥有社会科学方面的高级学位，但是他们都对自己的社会研究和政治倡导充满激情。他们的政治理念也并非完全一致。温和派支持中程改革，激进派（通常是社会主义者）主张重新建构。不过，温和派与激进

派常常能够通过共同建立的组织进行协同合作。在他们起中枢作用的改革联盟中包括劳工领袖、社会福音主义者、中产阶级改革者和女性改革者。他们为自己赢得了政治进步主义者的名声。他们和他们的同盟者利用政治进步主义作为政治品牌,寻求扩大政府的作用。

这些社会科学学者兼活动家们所寻求的政府是积极干预的政府。这个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来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剥削,管制新的工业经济,推动种族平等。他们认为,在他们这样的社会科学家的领导或指导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可以共同找出解决当代问题的方法。他们认为,国家的角色并非只是确保竞争性的市场的规则制定者,而是要成为强有力的规管力量,成为美国人民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在这个社会科学网络中的男男女女不是主要的权力掌握者,不是金融大亨,不是将军,不是工业巨头,也不是民选官员,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公共倡议,能够影响掌权者和不是那么有权势的人的决定和行动。他们是从事社会活动的高级和普通的知识分子,换言之,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起初,他们的活动局限在大学、社区中心、私人机构等私人权力中心,后来,他们逐步进入公共权力之中,充当决策角色,利用公共权力追求人道主义目标,甚至寻求影响选举。

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当中的许多人把自己的努力放在改善被剥削的产业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生活上。消除童工、缩短女工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工业安全和工人补偿,改善居住条件,减少贫穷等,都是他们追求的主要社会改革活动。这里,我们选择三个实例来展示进步主义知识分子是如何利用社会科学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的。

(一) 亚当斯与赫尔睦邻之家 (Hull House)

作为社会活动家和改革者,进步主义者推动改革的主要模式是个人倡导和公民参与。进步主义者个人倡导和自觉行动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在弱势群体社区成立睦邻之家。参与社区服务中心活动的主要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她们在外来移民社区中成立服务中心。在服务中心,进步主义者通过举办英语班、职业技能训练班、公

民课程、男女童俱乐部、打篮球和垒球等办法教导移民成为美国人 (Davis, 1967)。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与移民一起学习,认识到移民文化是城市新来者的力量源泉。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简·亚当斯 (Jane Addams)。

亚当斯是芝加哥“赫尔睦邻之家”这个最著名的社区服务中心的创办人。1888年,亚当斯和她的中学同学 Ellen Gates Starr 到英格兰旅行,在偶然的情况下,访问了伦敦贫民窟中的“托因比睦邻之家”(Toynbee Hall),很受启发。1889年,她们决定在美国也成立这样的服务中心。她们在芝加哥外来移民聚居的地方找到了一座叫 Hull House 的房子,把它改造成为社区服务中心,即后来闻名于世的“赫尔睦邻之家”。建立社区服务中心与亚当斯的理念是分不开的。亚当斯认为,社会的所有要素和阶级是互相依赖的,社会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忽视其他的社会成员,因为社会是一种关系,具有共同利益。她认为,穷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并非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原因导致的,而是社会条件造成的。因此,要通过改善社会条件来满足个人需要。她试图通过成立睦邻之家这类社区服务机构来代替传统的私人慈善活动。

赫尔睦邻之家在1889年成立后,很多人追随亚当斯,善款也源源不断。因此,赫尔睦邻之家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移民服务中心。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在城市中扩张极为迅速。到19世纪末,差不多成立了超过100个睦邻之家。这些睦邻之家提供的服务包括:医疗服务、儿童照顾,以及法律援助。它们还为外来移民提供英语、职业技术、音乐、艺术和戏剧课程。在1893年,当时美国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赫尔睦邻之家每个星期服务的人数超过2000人。

亚当斯支持工人的罢工活动。因为她认为恶劣的工作条件导致工人的罢工。亚当斯的态度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并且影响到赫尔睦邻之间的筹款活动。亚当斯自己通过写文章、巡回讲课来筹集经费。亚当斯不仅是著名的社会工作者,而且也是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她认识到,如果法律得不到改变,贫穷问题就不能解决。因此,她把

自己的努力指向导致贫穷的根本原因。她和工人们一道到伊利洛伊州去进行游说,要求检讨有关童工、工厂巡查和青少年犯罪方面的法律。亚当斯与工人们一起争取制定保护移民免受剥削、限制女工工作时间、强制儿童上学、承认工会和提供工厂安全的法律。她还是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袖。1911年,她成为“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的第一位副主席。1912年,她为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进步党进行全国助选。亚当斯还是著名的反战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组织了妇女和平党和国际妇女大会。

(二) 匹兹堡调查

设在纽约市的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是一个以资助社会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小基金会,成立于1907年。该基金会是一个研究中心,为其他机构的研究者提供研究经费,并出版其资助的研究者和访问学者的研究成果。该基金会的研究领域涉及劳动市场、移民、文化、宗教、教育、经济和社会问题,目的是“改善美国的社会和生活条件”。铁路大亨和金融家拉塞尔·塞奇的遗孀提供了最初的1千万美元资金。基金会早期的研究集中在贫困和老年问题,协助改善医院和监狱条件,发展社会工作成为一种专业。该基金会协助实现了在医疗、城市规划、消费者信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计划方面的早期改革。

在1907-1908年,拉塞尔塞奇·基金会资助了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进行的一项大型的关于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调查。这项调查被称为“匹兹堡调查”,它是进步时代改革运动的标志,也是20世纪社会史和城市研究的经典。

20世纪初的匹兹堡是美国典型的工业城市。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逃离贫困来到美国寻找工作。像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大企业控制着地方政府。大部分匹兹堡市民的生活非常贫困。进步主义者和城市改革者充满惊奇地看到工人阶级和移民的生活,公司工业主义和工业化对城市环境的影响。这次调查虽然也涉及矿工和铁路工

人,但主要是针对钢铁工人。

匹兹堡调查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城市状况调查。这次调查在美国广为人知,它揭露了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丑陋一面。大约 70 位调查员参加了是次调查,包括巴特勒(Elizabeth Beardsley Butler, 1885 - 1911)、白赢顿(Margaret Byington)、坎曼斯(John Rogers Commons, 1862 - 1945, 威斯康星 - 麦迪逊大学制度经济学家和劳工史学家)、伊斯曼(Crystal Catherine Eastman, 1881 - 1928, 著名律师、记者、社会主义者)、菲奇(John Andrews Fitch, 1881 - 1959, 坎曼斯的学生),这次调查的负责人是美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改革家保罗·凯洛格(Paul Underwood Kellogg, 1879 - 1958)。他的目的是把改革者的目标与最新的科学调查方法结合起来。他希望调查结果能够唤起公众对美国工业化中猖獗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警惕,同时影响匹兹堡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企业和政府政策的制定。

调查开始于 1907 年。调查结果最初于 1908 年和 1909 年发表在《矿工》等杂志上,后来整理为一套丛书,共六册(4 本专著和 2 本文集),于 1909 年至 1914 年出版。其中最有名的是 1910 年出版的,由伊斯曼撰写的《工作事故与法律》。伊斯曼的书以在匹兹堡地区收集到的一年内的工业死亡数据、三个月内的工业事故数据为基础,一共有 1000 多个案例。调查者追查了每个事故的性质,包括原因、谁负责、对家庭的经济影响等。虽然当中有矿工和铁路工人,但主体是钢铁工人,因为钢铁业是最大的制造业。在调查中,伊斯曼主要想为以下两个问题寻找答案:一是工人和雇主究竟谁应该对事故负责,二是谁承担了事故的经济责任(Eastman, 1910:5 - 7)。调查发现,受工伤的工人和那些因工死亡者的家属承受了工业事故的经济后果,尽管这些事故主要是雇主造成的。调查报告的作者认为,基于社会公正的考虑,雇主应该承担工伤事故的主要经济负担,从而令他们更积极地消除引致工伤事故的原因。

调查提出的关于以经济诱因来加强工伤事故预防的呼吁得到了

广泛的回应。它迅速成为要求建立工人赔偿制度的重要理据。劳工和工商界都支持建立工人赔偿制度。1911年,威斯康星州成为第一个建立工人赔偿计划的州。参与过匹兹堡调查的坎曼斯是这个计划的法律起草者,他相信精心制定的法律能够带来社会变迁。到1921年,大部分州都建立了工人赔偿计划(Maclairy, 1981:18-24)。

(三) 凯莱与童工女工权益保护

佛罗伦萨·凯莱(Florence Kelley)是进步时代著名的劳工权益活动家。她是女权主义者,也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时,她就成立了社会科学俱乐部。后来,她又去苏黎世大学这所当时欧洲唯一一间授予女性学位的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她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翻译成英文(Sklar, 1995)。

1891年,凯莱回到美国,来到芝加哥,住在亚当斯的赫尔睦邻之家。她和亚当斯一起定期走访中产阶级妇女组织,向她们寻求财政和政治支持。她们还说服芝加哥妇女会的民政事务部(The Home Department of the Chicago Woman's Club)为凯莱提供财政支持,帮助她开展对女工的咨询服务。在此期间,凯莱还完成了西北大学的法学学位课程,成为反对不安全劳动条件运动的领袖。她访问了大约一千个制衣业血汗工厂的受害者,记录了他们在工厂和家中的状况。由于她在劳动安全方面很有名声,联邦劳工部部长卡罗·莱特(Carroll Wright)聘请她领导一队工人收集芝加哥第十九区的每一家每一户的资料。凯莱常常在反对血汗工厂的抗议集会上演说。1892年,她撰写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关于血汗工厂问题的报告。她在报告中提出了改善血汗工厂条件的建议,推动了伊利诺州第一个工厂安全立法的通过。1893年,该州通过法律,限制妇女和儿童的工日不可超过8小时,禁止血汗工厂,同时成立一个有12名工作人员的工厂监督办公室,其中一半必须为女性。凯莱则成为首席工厂监督员。她用4个词来概括自己的高效改革策略:“调查、教育、立法

和执行”(Sklar, 1999: 483 - 486)。

1897年,共和党人控制了伊利诺州州议会。接着,伊利诺制造商协会起诉凯莱,并且最高法院也判决限制女工时间为每天8小时的法律违宪,凯莱也失去了首席工厂检查员的工作,但是,她并没有退缩。她继续与赫尔睦邻之家合作,开展各种社会改革活动。其中一项重要活动是消费者运动。凯莱提出了“消费者标签”概念,用以教育消费者购买那些善待工人的工厂生产的产品。这一概念很快就得到了“全国消费者联盟”(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的采纳,并发展成为全国性计划。凯莱也因此被提名为“全国消费者联盟”的总干事。1898年,凯莱离开赫尔睦邻之家,就任“全国消费者联盟”的总干事,并且把该组织改造成为全美著名的支持保护女工和童工劳动立法的代表性组织。以纽约为基地,凯莱在此后的20年中成为争取保护劳工立法、废除童工和其他改革的核心人物(Stromquist, 2006: 85)。1908年,俄勒冈州的消费者联盟与一家当地洗衣店店主打官司,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俄勒冈州关于限制女工每日工作10小时的立法合宪。而支持这一判决的重要依据正是凯莱曾经进行的血汗工厂调查。接着,其他各州纷纷同意限制女工和童工每日的工作时间。最后,所有工人的工作时间都受到了限制。

五、结 论

进步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一面镜子(Gilmore, 2002: 17)。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种种社会不和谐因素,特别是阶级对抗,进步时代的美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由社会科学学者变身而来的社会活动家们没有悲观失望,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坚信人类再造自己世界的能力。他们以自己掌握的社会科学知识为武器,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变革活动。在他们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美国在20世纪初进行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成功地化解了社会矛盾,避免了社会革命,实现了社会和谐,进而确立了美国在

20 世纪的强国地位。

进步主义改革者观察社会不和谐的途径和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令我们受益匪浅。对我们来说,进步主义者对人类行动的信念远比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更能给我们教益。21 世纪之初的中国,面临着与美国进步时代大致相当的社会经济环境。同样是经历了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包括劳资冲突;同样是经历快速的城市化和大规模的移民。可以说,中美两国在时差一个世纪的空间中经历了由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移民所驱动的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迁。面对劳资冲突、外来移民、城市贫困、腐败所引起的种种社会问题,我们的知识分子又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动的呢?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在这方面,美国进步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榜样。

不可否认,进步主义改革者并没有完全解决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在他们的行动和目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们的许多社会目标也没有得到实现。而且,也有分析认为,进步主义者推动的社会改革实际上包含有社会控制的意图,试图把他们自己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强加给从欧洲大陆迁移而来的新移民。尽管如此,他们坚信现存的各种社会冲突都可以得到解决的乐观主义,他们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和谐的满腔热情和积极行动,无疑具有永恒的价值。对于处在大规模社会经济变迁中的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说,知识分子的这种行动主义和参与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知识分子进行个人倡导和参与社会变革也需要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

(责任编辑:朱亚鹏)

参考文献

Chamber II, J. W. (1980). *The Tyranny of Change: America in the Progressive Era, 1900 - 1917*.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Crunden, R. M. (1982). *Ministers of Reform: The Progressives' Achievement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 1889 - 1920*. New York: Basic Books.

Davis, A. F. (1967). *Spearheads for Reform: the Social Settlements*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890 – 191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astman, C. Ed. (1910). *Work Accidents and the Law*, New York: Charities Publication Committee.

Glad, P. W. (1975). *Progressive Century: The American Nation in Its Second Hundred Years*. Lexing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Gilmore, G. E. Ed. (2002). *Who Were the Progressives*.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Fink, L. (1983). *Workingmen's Democracy: The Knights of Labor and American Politic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Haskell, T. L. (1977). *The Emergence of Professional Social Science: The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d the Nineteenth – Century Crisis of Authorit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Hofstadter, R. (1955).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Knight, L. W. (2005). *Citizen: Jane Addam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sch, C. (1991).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Lubove, R. (1965). *The Professional Altruist: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Work as a Career, 1880 – 1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claury, J. (1981). The Job Safety Law of 1970: Its Passage Was Perilous, *Monthly Labor Review*, 18 – 24.

Mowry, G. E. (1958). *The Era of Theodore Roosevelt, 1900 – 1912*. New York: Harper & Row.

Recchiuti, J. L. (2006). *Civic Engagement Social Science and Progressive – Era Reform in New York Ci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Sklar K. K. (1995). *Florence Kelley and the Nation's Work: The Rise of Women's Political Culture, 1830 – 19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tromquist, S. (2006). *Reinventing “The Peopl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